



未名·观点丛书



东亚历史比较研究

王晓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观点丛书

东亚历史比较研究

王晓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历史比较研究 / 王晓秋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未名·观点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0304 - 0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东亚 - 历史 - 对比研究 IV. ①K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9933 号

书 名: 东亚历史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晓秋 著

策 划 编 辑: 杨书澜

责 任 编 辑: 魏冬峰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301 - 20304 - 0/K · 0841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 weidf02@sina.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13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人们常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可见比较可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对不同时间或不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异同，深化其认识，发现其联系与差别，从而探索历史真相、历史本质以至历史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历史的比较研究由来已久，其实古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常常运用这种方法去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在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和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等著作中都有这样的例子。不过到了近代，比较历史学才成为一门有理论和专门著作的学科。例如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的名著《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就是一部比较历史学代表作。现在，它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出现许多分支学科，如比较政治史、比较经济史、比较社会史、比较文化史等等。历史比较研究在中国也日益受到重视和运用，发展方兴未艾，成果不断涌现。

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有助于启发思考，深化认识，

探索规律以及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它也有助于克服一般历史研究中简单化、概念化和片面性、狭隘性的弊病。尤其在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现实,启示未来等方面,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中国近代革新思想家和史学家们曾经运用中外历史比较来激发民族觉醒,鼓吹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笔者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列国政要比较表》。他在序言中大声疾呼:“凡物进退赢缩之故,率视其比较而已。有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立见,而耻心生,惧心生,竞心生;无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俱不见,自尊自大,不耻,不惧,不竞,无复有求进之心,则退将至矣。”他把比较视为民族能否觉醒、自强、变革、进步的关键。因此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集中精力写了《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历史比较研究的著作,进呈给光绪皇帝,希望光绪皇帝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变法决心,仿效日本明治天皇的变法措施,吸取波兰变法失败被瓜分亡国的惨痛教训,这些书对戊戌维新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近现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们还常用中外或古今历史比较的方法来鼓吹改良和革命,号召救亡和启蒙。例如对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比较,中国近代农民革命与古代李自成起义、外国德国农民战争的比较,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比较,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印度、土耳其等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更加关注中外改革开放历史的比较和中外现代化进程历史的比较研究。曾涉及中国和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韩国、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的改革、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有的论述更深入到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某个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层面的比较,或者是某些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比较。

然而,历史的比较研究并非随意把两个历史现象拿来就可以作比较的。它必须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应属于同类型或同层次的历史现象才可以作比较,如同样是改革、革命、农民战争,或者同样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等,或者至少是比较的双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关系。因此在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时,一般首先要确定可比性的主题,然后分别研究可比项各方的特点、过程和根本属性,再比较其异同,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曾经对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当然,这把钥匙并不是轻易能够找到的,由于它涉及两个或更多个国家、时代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比较,就必须先吃透比较项各方的历史,因此就要比一般历史研究难度更大,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苦劳动,收集更多的中外史料,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大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东亚国家曾经处于同一个东亚文明圈,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并在近代都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东亚各国的历史既有许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异性,还有不少关联性,从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东亚各国文化学术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现实的迫切需要。

笔者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近三十年来特别关注东亚历史的比较研究,而且有机会多次到日本、韩国、泰国等东亚国家访问研究、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收集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并与各国学者广泛交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钻研,写出了一批较有新意的东亚历史比较研究论文与讲稿。如本书收集的第一、二篇是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讲演的讲稿。第一篇《东亚国

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是试图从东亚历史的大视野出发,运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论述东亚国家在各个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时代东亚各国发展道路上的共性和个性,并剖析东亚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宏观长时段的比较研究课题。相比起来,第二篇《近代中日改革和现代化历史的比较》则缩小时空范围,集中比较近代中日两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历史进程,探讨近代中日两国处境的起点极为相似,而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结果却大不相同的各种原因和因素。并着重从比较两国应对外来挑战、制定改革目标、领导能力与政策,以及甲午战争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历史的启示。

第三篇《19世纪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比较》,是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稿。它是从对外意识这个角度切入做东亚历史比较。对外意识主要指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国事情的考察、认识和判断、评价。对其作深入比较分析有助于理解19世纪东亚各国不同的方向、道路选择,也会对当今东亚国际关系有所启示。第四篇《19世纪下半叶中、日、泰三国改革与现代化的比较》,是作者到泰国访问研究后的成果,发现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势力冲击下,东亚只有日本、中国、泰国三个国家保持了“独立国”地位,而且三国都进行了君主制政权下自上而下的改革并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其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关联性和互相影响,值得深入比较研究探讨。因此归国后便尝试做了这个三国历史比较的课题,并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泰国法政大学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第五篇至第十篇是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日两国历史以及两国之间关系与两国对待西方文化态度等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如《中日两国闭关锁国与开国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成败原因的比较》。在西方势力冲击下,中日两国都从锁国到开国,从洋务到维新,历史背景相近,目标类似,措施雷同,为什么成效、结局如此不同?这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学者都想探讨、解答的“历史之谜”。作者试图从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加以由表及里的层层剖析,给出自己的答案。此文曾被中学语文教学参

考教材作为比较研究的一篇范文。此外还有从文化思想角度分析比较中日两国文化观、价值观的差异。如《近代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态度的比较》、《晚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观差异的比较》、《晚清中国形形色色明治维新观的比较》等文,读来颇耐人寻味。第十篇则是从军事战争的角度所作的《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的比较》。对相隔半个世纪、影响两国历史命运的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从战争的性质、手段、成败原因,以及两次战争之间的联系和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加以比较研究,以史为鉴,发人深省。

对于中国与朝鲜、韩国历史的比较,除了前面谈到的发展道路、对外意识外,第十一篇是以近代中、韩两国两次最大规模的农民革命为比较主题,即《中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韩国东学农民革命的比较》。这也是很少有人做过的课题,论文从两次农民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原因、性质、组织形式、思想宣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等多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中、韩这两次农民革命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该文曾在韩国举行的纪念东学农民革命学术大会上作过讲演。

最后几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比较研究个案,但也都与东亚历史有关。如《近代中国改革先驱者对世界认识的比较》、《康有为三部外国变政考的比较》、《晚清中国官员三次集体出洋的比较》等文,都涉及对日本的认识、考察和借鉴。最后一篇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所作的《辛亥前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革命活动的比较》,论述孙中山如何把东北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南洋变成中国革命党人的两个海外革命基地,并对孙中山在两地的革命活动的异同作了较深入具体的比较,同时也论述了留日学生和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以上只是作者治史四十余年,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在东亚历史比较研究领域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和体会。抛砖引玉,贡献给对历史比较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同行、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并欢迎批评指正。如果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和启发,我就很满足了。由于本书所收各篇讲演稿和论文

是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刊物发表的讲演和论著,其中有些内容和词句难免有某些重复和雷同,为保持讲稿和论文原貌,未作太多删改,特此说明,敬请读者鉴谅。

最后,我还想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我曾经访问过的日本、韩国、泰国、美国、法国等国的许多学者和大学及研究机构所给予的学术交流、研究考察、收集资料等方面的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向支持本书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

王晓秋

2011年10月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遨游史海斋

目 录

东亚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 / 1
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 / 20
19 世纪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比较 / 51
19 世纪下半叶中、日、泰三国改革与现代化的比较 / 62
中日两国闭关锁国与开国的比较 / 77
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成败原因的比较 / 91
近代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态度的比较 / 104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观差异的比较 / 118
晚清中国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的比较 / 125
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的比较 / 141
中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韩国东学农民革命的比较 / 157
近代中国先驱者世界认识的比较 / 172
康有为三部外国变政考的比较 / 184
晚清中国官员三次集体出洋的比较 / 207
辛亥前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革命活动的比较 / 220

东亚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

今天我试图从全球和东亚的大视野出发,运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东亚国家各个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时代东亚各国发展的历史。重点探讨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性和个性,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分析,并且剖析一些东亚发展史上的热点和疑点,特别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力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古代东亚文明的兴盛

谈发展道路,决不能割断历史。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之上,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而且是现存唯一延续不断的人类

古代文明。东亚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甚至使得许多西方的旅行家、思想家为之倾倒。古代的东亚不仅文化发达,经济发展也处在当时世界的前列。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千年经济史》中估算,在1700年,也就是清代康熙三十九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总量的22.3%,日本占4.1%,中国和日本加起来占世界总量的1/4还多。而当时整个西欧国家的生产总量加起来不过22.5%。当时的英国只占2.9%,美国仅仅是0.1%,这是1700年世界经济的情况。所以当时的中国无论文化还是经济都处在世界的前列。那么古代东亚国家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奥秘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 东亚的地理概念和特征

东亚顾名思义指亚洲的东部,与之相对的有西亚、南亚和中亚。从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立场出发,西方人常常称东亚为“远东”,而东亚的人则曾称西方为“泰西”。东亚分为广义的东亚和狭义的东亚。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现代的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还有俄国的远东地区,东南亚包括越南、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等东盟国家。

狭义的东亚指的主要是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这一区域。为什么把中、日、朝、韩叫作狭义的东亚?因为这几个国家不仅有地理上的联系,而且还有着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共同性。过去我们称之为“东亚文化圈”、“东亚朝贡贸易圈”或“东亚华夷秩序”。我们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不能用地理来决定一切。但是不能否认,地理因素对各国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尤其在古代。我们知道东亚东临黄海、东海、日本海、太平洋,西靠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昆仑山、帕米尔高原。所以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和其他的文明相对隔离的小环境。而东亚的气候比较温和,中国有大江大河,适宜于农业和水利的发展,也便于江河和沿海的交通,这个地理环境培育出了古代东亚一种较高水平的农业文明。东亚地

区的中国、朝鲜、韩国（在古代，朝鲜半岛北南的朝、韩统称朝鲜）和日本从地理上看恰好是大陆、半岛和岛国，也就是从核心、外围到边缘的放射型文化圈。中国是核心，朝鲜半岛是外围，到了日本列岛已经是东亚文化圈的边缘了。这种地理位置对这几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国民的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常常说他们是“岛国根性”。岛民的心理一般来说比较狭隘。但是他们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也有他们的有利条件，就是他们更容易接受外来新事物。因为它跟核心地区离得比较远。

（二）关于东亚文化圈

古代东亚之所以能创造出高度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离不开的。东亚文化圈又可以叫做“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有的人更通俗地叫它“筷子文化圈”。那么，中华文化是如何传播、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促进两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且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东亚文明呢？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有各种途径和方式，这里主要讲四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移民。在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可以很方便地交通，到日本列岛可以通过朝鲜半岛渡海或沿着东海过去。所以中国的移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说公元前 11 世纪，就是周武王的时候，箕子带了很多人到朝鲜去。秦汉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有更多的中国人逃到朝鲜。汉初的时候，卫满率领他的族人到朝鲜自立为王。中国到日本的移民也很早。中国人到了朝鲜以后，通过两条路到日本，一条是通过朝鲜海峡到马岛，另一条是沿着所谓的日本海环流路，到达日本的北陆地区，本州的北部。

在公元 2、3 世纪的秦汉之际，有一批中国人移民到日本。其中象征性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徐福。徐福骗了秦始皇，带了三千童男童女和中国的工具种子等出海东渡。“徐福东渡”是司马迁《史记》中最早记载的。但司马迁没有明确说徐福到了日本，后来中日两国民间传说都

把徐福描述成中国上古向日本移民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日本社会正从以采集为主的绳文时代进化到以农耕为主的弥生时代,这个发展跟中国的大批移民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学者也承认。中国去日本的移民一直没有断,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都有。比如明末有名的思想家朱舜水和隐元和尚等等。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遣使。公元1世纪到7世纪,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三个国家一个叫高句丽、一个叫百济、一个叫新罗。这三个国家都跟中国有遣使来往。唐代初年百济派了20多次使节到唐朝,新罗派了30多次,同时唐朝也派了9次使节到新罗。日本遣使也很早,倭奴国早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就向当时的东汉王朝派遣使节,后来倭五王时代也向中国遣使进贡。特别是到了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开始派遣大型的使节团即遣隋使、遣唐使到当时中国的隋朝和唐朝,全面学习中国的经济、文化、制度、艺术等各个方面,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的第一次改革“大化改新”,就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明朝的时候,日本还派过遣明使,朝鲜在李朝时代的初年也向明朝派遣使节,据统计有300多次,到了清朝,李朝的使节有500多次,大量吸收中华文化。

第三个途径是留学。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不少日本、朝鲜留学生来中国。还有一种是留学僧,即留学的和尚。比较有名的日本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唐朝的时候,国子监里的新罗留学生有200多人,有些人还考中了中国的进士,在唐朝做官。宋代、元代、明代来中国的,更多的是日本的僧人,他们被称为入宋僧、入元僧和入明僧。

第四个途径是贸易。朝鲜对中国主要是朝贡贸易。日本对中国,在宋、元时期主要是民间贸易,明代是勘合贸易,到了清代是信牌贸易。

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文字、制度、法律、经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一直到社会习俗等等,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文字和儒学,这两个成为中华文化圈各国最重要的共性。

大约公元1世纪时,汉字传到了朝鲜半岛。4、5世纪时成为朝鲜的书面文字,直到19世纪末。朝鲜李朝的档案叫《李朝实录》,完全是使用汉字写的。“二战”以后,朝鲜首先于1949年停用汉字,韩国1970年也停止用汉字。但是现在很多韩国学者又提出要恢复汉字,他们认为停用汉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汉字大概是在公元3、4世纪传到日本的。根据日本史书记载,最初是一个叫王仁的博士,到朝鲜当五经博士,讲授儒学,在朝鲜又应日本官方的邀请,到日本去传授儒学。他为日本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等书籍。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还专门立了一块碑,叫做“王仁博士碑”,上面介绍了他怎样把《论语》等书籍带到日本。汉字也成为日本官方的书面文字。

到了公元8、9世纪,日本才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但是公文中大部分还是汉字,即使假名发明了以后,仍然是假名和汉字混用。直到现在,日本的文字中间还是既有假名又有汉字,还有很多西方的外来语。现在日文里面还有1945个常用汉字,他们的中小學生必须要学会,否则就看不懂日文。古代东亚三国共同使用汉字,为三国之间在外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人际交往、感情沟通等方面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公元1世纪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当时有些朝鲜人已经能够背诵《诗经》。到3、4世纪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已经建立了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百济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讲儒学。7世纪的时候,新罗国也开设了国学,学习儒学。到12世纪的时候,朝鲜高丽王朝还设立了经筵制度,专门讲授儒学。到了朝鲜李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成均馆,讲授儒学。后来成均馆变成了一个大学,叫成均馆大学。这个学校是以前世界上唯一有儒学院的大学,这个儒学院不但学儒学经典,还学儒家的礼仪,包括祭祀的仪式、舞蹈等。

日本是在4世纪的时候,由王仁博士带去儒家的经典《论语》。后来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更是带回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到了

17 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到朝鲜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它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特征。

朝鲜和日本在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完全是模仿、照搬中国的文化。比如日本,吸收了唐朝的大量文化,当时称为唐风文化。但是后来经过他们的融合、改造,逐渐形成了国风文化,就是具有日本本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朝鲜古代虽然使用汉字,但是后来为了使一般的民众、官员能够按朝鲜语来阅读,所以在 7 世纪的时候,新罗的薛聪就仿照汉字的结构,创造了一种韩文,叫做吏读文,又叫做谚文,就是官吏也能读的文字。到 15 世纪的时候,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命令官员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一种表音文字,当时称为正音字,就是今天的韩文。

日本人在公元 8、9 世纪的时候,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作为日本的字母来拼写日语。日语里边的假名有两种,一种假名是简化了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制造的,叫片假名,现在大部分用来记载外来语。更常用的是简化了汉字的草书而形成的,叫做平假名,平假名是现在日语里边最常用的文字。所以现在的日语就是由假名、汉字、再加上西方的外来语混合的一种文字。日本人在吸收了汉字的很多词汇以后,又创造了很多有新含义的汉字。例如“干部”、“主义”、“哲学”、“社会”等很多新名词,这些词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创造的,中国的留日学生又把这些汉字吸收回中国,成为汉语中的新名词,所以应该说中日的汉字文化是互相交流补充的。

日本人在学习中国的制度、礼俗时,有两样东西没有学。一个是宦官制度,一个是缠足的礼俗。因为太监制度、缠脚风俗是陋习,所以他们没有学这些,我觉得是明智的。日本还对学习到的东西加以改造、推陈出新,有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后,逐渐被日

本化了,他们把儒学与日本固有的神道结合起来,神儒调和,还把儒学跟佛教结合起来,儒佛调和。朝鲜也有很多儒家的学者对儒学进行了发展。比如说朝鲜学者李退溪,他对儒学的研究很深,被称为朝鲜的“朱子”。

中国的饮茶、书法、插花、武术等传到日本后,被改造成一种独特的道的文化和艺能,日本人称为道文化。如喝茶变成茶道,书法成为书道,插花变成花道,剑术变成剑道,射箭变成弓道,武术变成柔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发展。还有中国的一些工艺,比如中国的扇子、刀箭、漆器、陶器、瓷器等传到日本和朝鲜以后,也得到推陈出新。中国的扇子原来主要是圆的团扇,后来日本和朝鲜把它改造成折扇,可以折叠起来。而且扇面上可以有各种画,这种扇子后来又传回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使得古代中、日、朝三国人民更容易沟通、交流,这是东亚各国应该发扬和利用的一种传统文化遗产。

但是现在有些日本人和韩国人,企图否认中国文化的影响,鼓吹所谓的“去中国影响化”,要把中国的影响去掉。有的日本学者说,日本的文化跟中国没有关系,日本是一种海洋文化,中国是大陆文化。有的日本学者为了证明日本的历史也是非常古老的,不惜弄虚作假。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副理事长藤村新一,为了证明日本历史很早,自己偷偷地往地里埋文物,然后再挖出来,说是新发现。

韩国有些学者现在也在制造一些舆论,说黄河文明的祖先实际上是韩民族。有的韩国电视剧也在歪曲历史,这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应该尊重历史。

(三) 关于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

古代东亚各国之间有一种前近代的国际秩序,就是人们常说的“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它对古代东亚各国的发展道路影响非常大,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华夷观念”是从中国发源的,后来逐渐成为东亚文化圈各国统治者